

# 那些选择教授职业的无政府主义者

学院中的无政府主义

沙织

## 学院中的无政府主义

杰夫·尚茨

无政府主义学者大卫·格雷伯在他的著作《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片段》的第一部分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学术界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么少？”对格雷伯来说，鉴于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真正爆发和学院外对无政府主义的激烈辩论，尤其是在最近出现的众多社会运动中，这就成了一个紧迫的问题。尽管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与实践蓬勃发展，但大卫·格雷伯困惑于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繁荣并没有在学术界得到反映。格雷伯似乎渴望马克思主义者在新左派学生中兴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后进入学院所取得的那种成功。正如他在将无政府主义者的成功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功进行比较时失望地指出的那样：“在美国，有成千上万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很少有学者愿意公开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2004:2)。在他看来，这应该引起无政府主义者的关注。

然而，格雷伯的担心似乎是毫无根据的。从1999年西雅图会议开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学术领域中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数大幅增加。的确，可以肯定地说，在过去的十年里，无政府主义者在学术界的大厅里开辟了空间，这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不一样。对于那些正在攻读研究生和已经成为教职员工的人来说，这一点尤其如此。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在著名的，甚至是所谓的精英大学中担任职务，包括加拿大女王大学的理查德·戴，英国拉夫堡大学的露丝·金纳，以及一度在耶鲁大学(现在伦敦)的大卫·格雷伯。事实上，拉夫堡大学的政治系已经积极招募研究生参加一个专门研究无政府主义的项目。无政府主义在学术界的兴盛也反映在专业学术活动的其他关键标志上。这些包括：专注于无政府主义理论和实践各个方面的学术文章；大多数主要学术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书籍；越来越多的课程以某种方式涉及无政府主义或将无政府主义纳入课程内容。或许足够讽刺的是，也出现了专业认可的无政府主义研究人员协会和网络，比如英国政治科学协会的无政府主义研究网络。突然间，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学者几乎成了时髦。

有一段时间，实际上是不久以前，这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奇怪的处境。无政府主义者一度对学院抱有相当健康的怀疑，认为它是一个精英机构，完全与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结构的再生产和延伸联系在一起。然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对他们在学术界新获得的认可日益高涨的热情，以及这给越来越多的无政府主义者考虑学术项目的鼓励，并没有与对无政府主义者转向学术界的局限性的批判性反思相匹配。这篇文章提供了这种反思的开端，并提出了一些警告。

我要澄清的是，我绝不是在批评个别无政府主义者选择从事学术工作。我当然不是建议无政府主义者离开学校或离开学院，就像前几代社会主义者抛弃大学从事工业工作那样。当然，无政府主义思想发展和繁荣的地方越多越好。新保守主义学者在改变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取得的进步，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提供了智力资本，同时使工人阶级学生更难以接受高等教育，这表明当我们在任何领域放弃或失败时会发生什么。

同时，将无政府主义学术活动与其他类型的无政府主义活动联系起来，也很重要。如果无政府主义者要在学术界有效地发动斗争，甚至更重要的是，如果学术无政府主义要对学术界以外的斗争有所贡献，那么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明确的讨论，这种讨论不应倾向于不加批判的庆祝，也不应倾向于嫉妒地渴望一些我们完全可以不需要的东西。我是作为一个蓝领出身的人写这篇文章的，我是我家庭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我在学校里花的时间可能也太多了，所以我从多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 学术无政府主义？

大卫·格雷伯将他最近的作品《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的片段》描述为“一系列思想、潜在理论的草图和微小的宣言——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人们一瞥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激进理论的轮廓，尽管它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存在”（2004:1）。格雷伯所关注的不存在的理论，主要是学术人类学中的无政府主义潮流。我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格雷伯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为什么没有无政府主义社会学、无政府主义经济学、无政府主义文学理论或无政府主义政治学。在提出这些问题时，格雷伯没有承认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学科”的无政府主义版本确实存在，这暴露了他真正关心的问题的根源。这就是在这些领域存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学术或专业版本，以及在既定的学科和机构内接受无政府主义理论。

事实上，在问这个问题时，“为什么没有无政府主义社会学？”格雷伯完全忽略了科林·沃德、保罗·古德曼和约翰·格里芬等人的重要社会学著作。人们可以在确定无政府主义经济学的重要贡献者时提出同样的观点，比如汤姆·韦策尔和拉里·甘博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家，虽然在当代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发展中极其重要，在无政府主义圈子中有影响力，但在学术社会学或经济学圈子中却只占据边缘地位。因此，问题不在于无政府主义社会学的存在，而在于它在学术界或专业社会学家中获得的认可、接受和合法化。奇怪的是，格雷伯甚至忽略了无政府主义社会学家的贡献，他们成功地将无政府主义理论引入了学术界，比如劳伦斯·蒂夫特和杰夫·法雷尔，这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

当我们回到人类学时，情况也是如此。格雷伯（2004:38）声称“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并不真正存在”，然后把为这样一个理论和实践体系奠定基础作为他的任务。然而，格雷伯的这一主张，甚至把自己塑造成纠正这种局面的人，对哈罗德·巴克莱（Harold Barclay）等人是一种伤害，后者几十年来一直不知疲倦地在公认的学术界建立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奇怪的是，巴克莱这个名字并没有出现在格雷伯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中。

然而，在这一点上，我要指出，鉴于格雷伯希望看到无政府主义在学术界得到认可的愿望，许多无政府主义者都非常善于发展超越主流社会科学的分析。事实上，这就是我所说的建设性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的宝贵贡献，从古斯塔夫·兰道尔到保罗·古德曼再到科林·沃德。同样，问题不在于无政府主义理论或理论家的缺失，而在于学术界对这些理论和理论家的接受程度。这正是格雷伯深深担忧的，但我不得不问，这种担忧是否被过分强调了，如果不是错位的话。

## 妖魔化

当然，毫无疑问地提倡无政府主义理论进入学术界，就是对学术知识生产中涉及的危险和过程进行不加批判地呈现。贝丝·哈通（Beth Hartung）在一篇更早、更不乐观的文章中描述了无政府状态与学术界的互动，她发出了这种谨慎的声音：“一旦一种理论从街头或工厂被引入学术界，就有可能颠覆革命性的潜力……换言之，知识变成了技术”（Hartung, 1983:88）。

正如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1978:16）同样认为的那样，学术著作经常将社会运动的观点和实践，如无政府主义，重新表述为“高度形式化和抽象的术语”。在布克金的观察近三十年后，纽曼和戴等自我认同的无政府主义者最近发表的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学术著作似乎确实延续了这种使无政府主义思想符合当时学术话语的风格和实质的做法。

即使受过社会理论研究生培训，熟悉这些文本中使用的语言，我也发现这些作品相当难以理解。它们是主要针对其他学者的文本，用学者最熟悉的专业语言几乎完全解决了学者关心的问题。这种做法与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共同的反先锋主义承诺相矛盾。

一些人试图为这种语言的使用找借口，他们认为，要解决思想的复杂性，需要一种复杂的语言，而不仅仅是更脚踏实地的表达的语法。虽然这对主流学者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立场，但我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必须更加努力地打破学术话语的排他性。

## 走近学院

正如格雷伯（2004）所指出的那样，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知识分子的作用绝不是形成一个精英阶层，试图通过正确的政治路线或分析来领导群众。格雷伯（2004）认为，学术界可能会从与无政府主义的知识生产和共享方法的接触中受益。在他看来，这样的接触将使社会理论沿着直接民主实践的路线重新塑造。这种方法，借鉴了最新社会运动的实际实践，将鼓励超越中世纪大学的实践——看到“激进”思想家“在昂贵的酒店会议上进行智力斗争，并试图假装所有这些都某种程度促进了革命”（格雷伯，2004）。从社会运动中汲取的方法，除了拒绝“赢者通吃”的尝试之外，也可能允许超越“伟大思想家”的知识方法。

然而，我不相信无政府主义者把精力花在以这种方式改革学院上是最好的。真正的问题是存在一种等级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将知识生产分开并提升，从而再现了大学作为排他性和特权机构的存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主要是通过反种族主义研究人员的辛勤工作，已经有了更多的参与性和基于社区的研究。与坐在扶手椅上想象的宏大理论，以及调查、统计和社会学科的社会科学相比，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与此同时，所有这些新的研究，无论如何“以社区为基础”，仍然发生在知识生产的专制和不平等的政治经济中，并受到其存在的制约。与几十年来几千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存在相比，一百或一千多名无政府主义教授出现在神圣的大厅里并不能改变这一点。

我担心的是，无政府主义者进入学院可能只是复制、加强甚至合法化了学院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而不是推倒城镇和大学之间、头脑和双手之间、学术和业余之间的墙。这无疑为那些

喜欢吹嘘学术自由和新自由主义大学的开放性的保守派学者的主张增添了一些光彩：“看，我们不排除任何人。我们甚至允许无政府主义者有一席之地。”

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无政府主义者通过“出版或消亡”的晋升压力和对终身教职的追求，开始将无政府主义塑造得符合学术知识生产的语言和期望，而不是相反时，会发生什么。这是学术马克思主义的致命缺陷之一。把人民的一种语言，从他们的斗争和愿望中产生出来，变成一种遥远的、抽象的、人民无法接近的东西，它们现在已经变成了被动的研究对象或“社会指标”，它们根本就没有出现。许多学术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宏大理论的另一变体，有点像室内游戏，也许因为其思想而令人兴奋，但很少受到社会关注。同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在无政府主义身上？一些批评学术启发的“后无政府主义”的人可能会认为，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后无政府主义”试图将无政府主义理论与深奥的后结构主义哲学融合在一起。

当然，借鉴社会科学的成果是有价值的，例如，为无政府主义思想提供信息。即使是主流社会科学也可以提供重要的信息和分析，帮助无政府主义者检查、理解、批评和改变社会。从克鲁泡特金到勒克吕 (Reclus)，再到保罗·古德曼和科林·沃德，无政府主义者的作品都显示了与学术研究接触对无政府主义理论发展有益的方面。同样，历史学家也提供了许多令人惊叹的作品，提供了对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见解，否则这些见解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毫无疑问，历史学家的著作对最近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做出了最大和最长期的贡献。

## 结论

总的来说，重点应该仍然是利用学术工作来为无政府主义分析提供信息和丰富内容，而不是利用无政府主义的分析来支持与人们生活几乎没有联系的学科或理论立场。就社会理论而言，我认为保罗·古德曼 (Paul Goodman)、科林·沃德 (Colin Ward)、默里·布克金 (Murray Bookchin) 和霍华德·埃利希 (Howard Ehrlich) 等理论家所做的工作为“实地”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提供了更多的帮助。这些人可能在大学接受过培训，但他们始终以引人入胜、通俗易懂的方式提供复杂的分析。无论是从他们的分析的适用性，还是从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关注点来看，情况都是如此。

无政府主义学者的主要方向必须是积极参与反对资本主义和国家的斗争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而学者们则在追求自己的兴趣，通常是非常个人的兴趣。无政府主义者需要认识到，当他们做学术工作时，其中大部分涉及对社会斗争贡献不大的“部门工作”或“专业发展”，其他人正在照顾组织工作 (他们可能正在理论化)。这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者不能在完成工作的同时为组织做出贡献，而是呼吁人们记住劳动分工。

我想指出的是，我绝不是在批评那些选择教授职业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代表某种出卖或妥协的观点是荒谬的。相信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有更糟糕的工作，接受一份薪水、福利和总体上体面的工作条件并不可耻：当然，只要你不成为一个学术老板，有教学和研究助理为你工作。我更关心的是，在学院内创造一个空间是否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首要任务，或者是否占用了活跃而有思想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不那么排外的环境中工作的时间。

参考文献

Bookchin, 1978. "Beyond Neo-Marxism." *Telos*. 36: 5-28.

Graeber, David. 2004. *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

Hartung, Beth. 1983. "Anarchism and the Problem of Order." *Mid-American Review of Sociology*. VIII(1): 83-101.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沙织

那些选择教授职业的无政府主义者  
学院中的无政府主义

<https://mp.weixin.qq.com/s/2eb6xxparJJd16jqIIJmDg>

**nightfall.buzz**